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
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鲁迅文学批评研究



人完全是坏的，坏人完全是坏的，
大不相同；所以人物，都是真的。
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
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之那文章的旖旎和
端，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
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
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
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
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长
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
心是厉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鲁迅文学批评研究

卜召林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文学批评研究 / 卜召林著 .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1

ISBN 7-5011-6706-0

I . 鲁… II . 卜… III . 鲁迅著作：评论著作—文学研究
IV . I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8758 号

鲁迅文学批评研究

卜召林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照排
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61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1-6706-0/I·416 定价：25.00 元

目 录

面对“异邦”的“新声”	
——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批评 (1)
面对“软刀子”、“老调子”	
——鲁迅对古代文学的批评 (17)
面对“佳花”和“佳花的苗”	
——鲁迅对新文学的批评 (37)
让鲜花更鲜艳	
——鲁迅文学批评的形象性特点 (49)
感觉·体验·想象	
——鲁迅文学批评的审美特征 (66)
激起读者的兴趣	
——鲁迅文学批评的启迪诱导性特点 (82)
崇尚“伟美”	
——鲁迅文学批评的倾向性特点 (97)
激情的迸发	
——鲁迅文学批评的感情色彩 (109)
反对“捧杀”和“骂杀”	
——鲁迅文学批评的实事求是原则 (123)
顾及“全篇”、“全人”和“社会状态”	
——鲁迅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 (134)
时代使然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鲁迅 (151)

立在时代制高点上	
——鲁迅文学批评的现实性特点 (167)
镶有色彩的“圈子”	
——鲁迅文学批评理论的特点 (185)
艺术迷宫又一座	
——鲁迅文学批评的贡献 (197)

附录：

鲁迅文学批评研究资料索引 (228)
后记 (253)

面对“异邦”的“新声”

——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不但以他那些“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人类的文学宝库，而且还将他那些很有见地的文学批评推动了新文艺的发展。鲁迅虽然没有关于现代文学的批评专著，但散见于他文集中的为青年作家的作品所写的序、跋、前言、后记、“小引”及有关评介文章，都闪耀着一些真知灼见，很值得学习和研究。

鲁迅在致力于对国人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凭着他的敏锐，发现统治者往往用封建旧文化的“老调子”奴役国民。同时，他还从“异邦”那儿听到了与这“老调子”完全不同的“新声”，于是，他“别求新声于异邦”，目的是为了批判封建旧文化改造国民劣根性。

“别求新声于异邦”，这是鲁迅 1907 年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出来的，也是他对西方“摩罗”诗人的介绍、对他们作品的高度评价的思想动因。鲁迅自从在《摩罗诗力说》中开始对外国文学批评以后，直到他逝世的 1936 年，他介绍、评论了大量的外国作家作品，并且一再表白欲求“新声”。那么，他所求的“新声”是什么呢？

一、“自由之音”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争取人权、倡扬自由的思潮渐渐漫延于西欧，西方越来越多的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个性解放，人的自由。另外19世纪初年，欧洲的一些国家还燃起了反对民族压迫争自由的斗争之火，并且越烧范围越广、愈烧愈烈。因此，许多诗人在其作品中高奏起爱国自由的雄壮的旋律，高唱起抗强暴、争自由之歌。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写下了不朽的争自由的诗篇。例如，一生为了反对沙皇的血腥统治，为波兰的独立自由而呕心沥血的密茨凯维支是这样，匈牙利的裴多菲更是世界著名的爱国诗人，鲁迅特别赞扬这样的作家。易卜生是外国作家中影响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有力的一个，而真正理解、正确评价、将易卜生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从其艺术的深邃中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的，鲁迅是最得力的一个。

当“风雨如磐故园”而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仍然还在“昏睡”之时，鲁迅就向国人热情介绍了易卜生及其部分作品，如《人民公敌》等。鲁迅介绍易卜生不惜以己之身与大多数人默认和承受的“世俗”社会相对抗，向侮辱、压制“个性的尊严”的社会挑战的精神。在介绍中，鲁迅明确表示的是赞赏的态度。易卜生的剧作不仅深刻地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婚姻家庭制度，而且提出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妇女解放问题、个性解放问题……这些问题能启人深思，耐人寻味。因此，《玩偶之家》等剧作在“五四”时期的我国思想界、特别是文艺界曾经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它影响了一代人。对此，鲁迅除了在1918年的有关“随感录”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外，曾在1919年10月写的《我们怎样做父亲》和1923年12月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两篇文章中，将易卜生剧作中涉及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来论

述和评析。在对易卜生的评析中，鲁迅认为，《玩偶之家》中提出来的妇女独立自由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妇女个人的独立问题，它还关系到更深一层的问题，即妇女“在家庭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①。实际上是把妇女在家庭中的自由提到在整个社会上的自由，在家庭中有“人”的地位提到在社会上也应有“人”的地位这一高度来论述。因此，可以这样说：对于易卜生在剧中提出的这一问号，鲁迅在评论中划了个句号。当然，这其中包含着鲁迅对易卜生的充分理解，对他提出来的妇女解放、争得与男子一样的平等自由权利等，鲁迅非常感兴趣和关注，并也在不遗余力倡扬。

著名的英国浪漫诗人拜伦是一个为争取自由的奋斗者。他曾说过：“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②。当意大利被奥地利所统治时，意大利人没有自由，其中有一个秘密组织，策划意大利独立，拜伦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他的参加，对意大利人民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因此，当意大利独立之后，马志尼怀着对拜伦崇敬的心情说：“意大利的独立，实在依靠拜伦。他是复兴我祖国的人啊。”^③ 对于马志尼的这一评语，鲁迅又有评论，他认为马志尼所说的“盖诚言已”^④。拜伦最感人至深的是他身为英国人，而为希腊的独立自由的革命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鲁迅就是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自由战士来颂扬的，当然更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自由、争自由的作家来评论的。鲁迅特别赞扬拜伦向往理想、喜欢战斗，“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⑤。

① 《坟·娜拉走后怎样》。

② 《坟·摩罗诗力说》。

③ 马志尼：《拜伦与歌德》。

④ 《坟·摩罗诗力说》。

⑤ 《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以及《杂忆》等文中，曾论及了拜伦敢于抗压迫争自由的斗争精神，作了非常切实中肯的评价。青年时代的拜伦因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早就投于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抗强暴、争自由贯穿他的一生，也贯穿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反抗强暴争取自由的形象，如康拉德、曼夫列特、卢希飞勒、哈诺尔特、唐·璜等等，他们“怀抱不平，突突上发”，“破坏复仇，无所顾忌”，“重独立而爱自由”；其实，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也显现着作者拜伦争自由的伟大形象。当然，拜伦争的自由还是资产阶级范畴的。所以鲁迅也指出：“盖拜伦者，自由主义之人耳^①。”也就是说、无论是拜伦的思想言行，还是作品中所宣扬的思想内涵，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追求。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来说仍然有进步作用。因此，对拜伦的作品，我们既要看到他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鲁迅在对拜伦及其作品的评价中，对这两个方面都曾中肯指出。对作家的“全人”和作品的整体都顾及到了。

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为自由斗争的精神是世所公认的。他曾经在诗歌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这里，他是把“自由”放到生命和爱情之上来看待的，把爱自由的精神已经弘扬到了最高点上了。裴多菲确实是这样，他把“自由”当做自己一生中奋斗的目标。对于裴多菲这样著名的自由战士，爱祖国争自由的伟大作家，鲁迅理所当然地崇爱，称裴多菲是“恶压制而爱自由”的战士，“所作率纵言自由”^② 的作家。俄国普希金也是一个高扬自由的精神的作家。他的《茨冈》这一长篇叙事诗表现了具有觉醒意识的人

① 《坟·摩罗诗力说》。

② 《坟·摩罗诗力说》。

物，这些人物生活在茨冈人和高加索山民之中，非常纯朴，他们追求和向往自由，当然也就不满意当时的社会。鲁迅认为，在普希金的这类作品中，沙俄上流社会的伪善，“既灼然现于人前，而及泼希之朴野纯全，亦相形为之益显。”^① 日本的有岛武郎也是个追求自由的作家。对于爱自由的作家，鲁迅总是特别喜爱的。他对西方作家要求是这样，对东方作家的要求也基本上是一致的。1919年冬季，鲁迅说日本的有岛武郎是一个有着“解放的心”、说了“解放的话”的“人生”中的“觉醒者”^②。在鲁迅的文学批评中，往往对追求自由的作家的推崇，对抗击封建统治、争取自由的作品的极力推崇和高度评价，是鲁迅文学批评中的一大特点。鲁迅对爱伦德的《时代精神篇》的批评，大约在他所评论的德国作家中评价是最高的。鲁迅的评语其中写道：爱伦德“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由之音”^③。其实，鲁迅也在用他那伟大壮丽之笔，评点、高扬那些有着“自由之音”的文学作品。意在让那“自由之音”发扬广大，深入人心，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促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为争取自由而不懈斗争，这就是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目的之所在。

二、“爱国者的声音”

鲁迅是爱国的，所以他特别崇敬西方的爱国作家。鲁迅向人们谈起他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时的思想动因时说过：“那时候……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④。在鲁迅介绍的外国作家

① 《坟·摩罗诗力说》。

② 《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

③ 《坟·摩罗诗力说》。

④ 《集外集拾遗补编·随感录》。

中，爱国主义思想特别突出的是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密茨凯维支早在求学时就参加了反对沙皇统治的爱国斗争的活动，曾经被捕入狱，以后还被强迫流放到俄国，但他始终没有灰心。他终于逃出俄国后，到了罗马，1834年11月波兰爱国群众在华沙爆发起义，密茨凯维支立即动身前去参加。然而他还未到，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他只好再度流亡到意大利、君士坦丁堡组织军队来抗击侵略者，不幸途中病逝。密茨凯维支的一生，不但是为民族独立、祖国的解放斗争的一生，而且还写下大量充溢着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为此，鲁迅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他的作品对中国青年有着有益的影响。鲁迅说密茨凯维支“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① 鲁迅不仅对密茨凯维支的爱国诗歌非常赞赏，对他的爱国诗剧也推崇倍至。如密茨凯维支的诗剧《先人祭》第三部，揭露了1830年华沙起义失败后，沙皇侵略者残酷镇压波兰、立陶宛两个民族的人民的罪行，在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密茨凯维支敢于写道：“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对此，鲁迅说：“报复诗华，益萃于是”^②。也因此，鲁迅一再称密茨凯维支是“复仇诗人”，在评论中一再赞扬他的复仇、反抗、爱国的精神。

鲁迅对裴多菲评价说：“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③

①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十一）》。

② 《坟·摩罗诗力说》。

③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十二）》。

对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这两位诗人，鲁迅都作了非常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反抗“异族压迫”，鼓吹“复仇”、“解放”。他们都是“爱国诗人”；更主要是他们作品中所弘扬的精神，是符合于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要求的。

对于裴多菲，鲁迅不但十分赞赏他不为腐朽势力所驱使，不为强暴统治所吓倒的硬骨头反抗精神，而且热情肯定他在为民族独立与自由而斗争的刚毅不屈精神。裴多菲的《我梦见流血的日子》，集中表达了19世纪民族革命家和爱国主义作家的共同心声。裴多菲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在抗击俄国、奥地利侵略军的战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鲁迅在提及裴多菲英勇献身时，曾激动地指出“平日所谓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盖至今日而践矣”^①。时隔20多年，鲁迅在为中译本《勇敢的约翰》（《英雄约诺斯》）写《校后记》时，还念念不忘地说裴多菲“是一个诗人和英雄”^②。这很能够表现出鲁迅对裴多菲由衷的敬佩之情。鲁迅不但自己一生志诚的爱国，并且对爱国的作家，不分国别，只要是正义的爱国者，他都持赞扬的态度。如对西方那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拜伦、雪莱、显克维文、密茨凯维支、裴多菲、普希金……等等，都是这样。鲁迅说：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③

① 《焚·摩罗诗力说》。

② 《集外集拾遗补编：〈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③ 《坟·摩罗诗力说》。

这些诗人的性格、言行和思想，虽然因民族不同、社会环境的原因，使他们有所区别，但就刚毅果敢、不屈不挠这一点来说，他们又是共同的。特别是他们的作品都是为了他们的祖国民新生、为他们祖国的强大而发出的“雄声”。鲁迅还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发问道：“求之华土，孰比之哉？”鲁迅也非常希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伟大爱国诗人。这从他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鲁迅早期所接触的西方的爱国主义诗人的作品，对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种催醉的作用。当然，他大量吸取西方文学、特别是爱国文学的营养，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的。他以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为立足点，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启发人民的爱国觉悟，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那些“摩罗”诗人，特别是那些爱国作家。1935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三）》一文中指出：“中国境遇，颇似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介绍西方的作家作品意在改造中国的现实。他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来介绍西方爱国作家的。这样的介绍，意义当然是更大的。鲁迅的文学批评，不仅深刻，而且总还能有新颖独到之处，想他人所未想到，言他人所谓言出。即使他对外国的爱国文学的评论，也有让我们引起思考的观点。例如他在列举出芬兰、菲律宾、越南、匈牙利等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以后指出，这些文学虽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但又有些区别：“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接着鲁迅评论说：

我因此以为世上固多爱国者，但也漏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

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①

当然，鲁迅所赞扬的爱国主义文学，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学，对于那些爱亡国者的“声音”，鲁迅则是特别反感和鄙视的。究其原因是，爱亡国者实际上和追怀古代的复古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鲁迅一贯对此持批判态度。

三、挣扎和反抗的“战叫”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19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资产阶级文学遗产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们的作品以其在艺术技巧上的重大成就，既反映了“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②，又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酷贪婪、腐化堕落的丑恶。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对于世界资产阶级文学高峰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鲁迅的评论较多，其评价也很高。1926年，鲁迅在和一个美国记者谈话时就说：“我觉得俄国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丰富”^③。过了6年以后，鲁迅又进一步评论道：“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做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④这“有益的东西”的重要一点就是“为人生”。鲁迅曾经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称作“为人生”的文学，认为“俄国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随感录》。

②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

③ 李何林编：《鲁迅论·新中国的领袖鲁迅》。

④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① 所以，鲁迅在评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对这反映“人生”特点的文学总是特别推崇。原因之一是它具有强有力地反抗斗争的特色。鲁迅指出，当“五四”前后，中国人民已经厌弃了那些专供胖得发愁的资产者“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② 文学，正在寻求切实指示的时候，就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挣扎和反抗，并和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③ 18世纪末、19世纪初，首先在欧洲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这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鲁迅的《坟·摩罗诗力说》是一篇全面评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力文，是一篇力在启示中国人精神的文章。鲁迅认为，要改变国民精神“枯稿”、“萧条”的状态，肃清封建的“思无邪”的毒害，才能使“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照明，不同凡响。”^④ 由此可见，鲁迅是从开启民智、振兴祖国的思想出发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诗人即“摩罗”诗人的作品高度评价。

为了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统治，探求启蒙民众的反抗意识来寻求“复仇和反抗”之声，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那些表达人民反抗暴政、要求民族独立的诗篇，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回忆当时自己受欧洲浪漫主义作家影响时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

① 《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

②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③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④ 《坟·摩罗诗力说》。

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②基于这一思想原因，鲁迅对那些表达反抗之意的作品总是以赞许的态度热情介绍。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和《茨冈》，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反抗叛逆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中的人物寻求自由，同上流社会决裂。鲁迅对此评价道：这些作品使上流社会的伪善，“灼然现于人前”^③。莱蒙托夫的叙事诗《恶魔》，写的是古代一个浪漫的天使反抗上帝的神话故事。诗中的恶魔，敢于反对一切束缚人们自由和意志的东西，他的力量，他对上天的高傲和敌视，鲁迅都给予赞扬。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文艺的作用是使人们看到自己的“优胜缺陷”，“更力自就于圆满”。在鲁迅看来，只有阐明人生真谛的文学才是有意义的。相反，那些目的就在供人们消遣、在那黑暗痛苦的时代尽讲些愉快风趣的话，这些无聊庸俗的作品，鲁迅是坚决否定的。因为这是在充满血和泪的社会里。

毫无疑问，文艺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文艺应反映人生，这是鲁迅反复强调的，也是他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西方同类作品特别看重的主要原因。易卜生大胆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世俗的虚伪，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道德沦丧，鲁迅认为，易卜生：“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制”^④。并且称易卜生是个“卓尔不群之士”。鲁迅后来在《〈奔流〉编校后记（三）》中谈到“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出“易卜生专号”的原因时

① 《坟·杂忆》。

② 《坟·题记》。

③ 《坟·摩罗诗力说》。

④ 《坟·文化偏至论》。

说：“我想，也还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占多数，那时的介绍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易卜生是“五四”初期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新青年》、《新潮》曾先后译载了他的剧本《玩偶之家》（娜拉）、《人民公敌》（《国民之敌》）、《群鬼》等剧作。这些作品在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斗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特别是这些作品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婚姻家庭问题，妇女解放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启发人们精神觉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鲁迅号召人们：“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并称易卜生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①。1925年，鲁迅仍将易卜生列为“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的旧“轨道破坏者”。^② 鲁迅介绍西方作家作品也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惊醒起来；在介绍的同时，对中国的旧传统文化的抨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文艺流派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文艺思潮，而文艺思潮也是社会思潮的产物。鲁迅介绍摩罗诗派，不是单从纯文学纯美学的标准来区分的，而是从这些诗人对社会都猛烈反抗、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这一共同的战斗特色来看待的。鲁迅当时已是“进化论”的信奉者，他运用这一新的思想武器，批判中国传统儒道两家的复古主义，认为他们的思想完全有背于社会的进化。他说：“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以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③ 同

① 《热风·随感录四十六》。

②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③ 《坟·摩罗诗力说》。